

乡村记忆

昔日乡村人养猪

冷大川

圈养猪，早年是乡村人家居家过日子习惯的惯例。一走进街门，迎面就可以看到猪栏连着厕所，坐落在正房西侧窗户外的院落边上。上世纪六七十年代，养猪既能攒粪挣工分领到钱粮，又能年关卖猪挣得一笔钱，贴补早起晚归、一天只挣四五角钱的困窘家境。

买猪崽

每年正月一过，大地回暖，人们会陆续到集市上抓(买)猪。那些年，招远城区的猪市场特别大。宽阔的河套沙滩，方圆几百米，有特定的奶膘(吃奶的小猪)市和壳郎(方言音，断奶后到育肥前猪的统称)市。市场上有县兽医站选派的专业阉割者，还有专业的皮条客即“猪经纪”。

刚开春的集日，猪市场最热闹。由此，平时习惯把人多喧闹的地方比作小猪市。村头巷尾常会接二连三地见到有人抱头小猪，或者远远地听到猪叫。有很多买猪人，或因骗猪集日太忙，或因骗过后血水淋漓，不便于往回带，就约好集日后来家里骗。平常日子，也经常会有骗猪者走街串巷，挨村骗猪。小孩子们则前簇后拥，腩前腩后跟随着，偶尔还会得到骗猪后户主送的猪蛋子。

备饲料

喂猪用的饲料，在没有粉碎机前，玉米、高粱、豆子、地瓜干、花生饼之类的精饲料不是用磨推就是上碾轧。每家都有磨屋，随用随推，插上几干。上碾轧的则不同，要看碾盘是否闲着，因为全村只有那么一个碾屋，有时得排号等着，或者头天夜里送点东西占着。粗饲料，如花生蔓、地瓜蔓等，则是先用铡刀铡一遍，再用棒槌、槌等器具敲细打碎。

有了粉碎机，无论粗、精饲料一律用机器粉碎。只是精饲料常年不定时粉碎，粗饲料则是在每年秋收秋种结束后直到冬天、最晚也有在来年正月十五前后集中粉碎的。粉碎过的饲料先用麻袋装好，再用小推车一麻袋一麻袋运回家，倒进囤子里。囤子大多放在闲屋，或者临时搭建的草棚里。囤子的直径大多都在1.5米左右，上口用竹子一圈一圈围起来，高高地顶着屋脊。

整个冬天和刚开春，一般都喂粉碎的饲料。各家在猪栏跟前安放一两口大瓮，叫猪食瓮。将粉碎的饲料放进瓮里沤泡几天，当看到瓮里的猪食有气泡冒出，加进的水变成了褐红色的浓汤，并散发着酸酸的气味，就算沤好了。猪特别喜欢吃这种经过发酵的粗饲料，家家户户的院子里，几乎都散发着这种特有的酸味儿。

野菜长出来，很多人家，特别是家里干饲料不够吃的，就开始漫山遍野地拔青菜。猪吃的菜种类特别多，连嫩草也吃得下。拔回家的野菜，我们当地都是直接挑到汤河，放在热水池子里焯。由于量多，一般是用粪叉子搅拌。这样不仅焯得均匀，而且洗去了泥沙，也去除了某些野菜的毒性。经过汤河水洗的马齿苋，猪吃起来特别顺口，像人吃面条那样，百吃不厌，而且不用添加精料。这得天独厚的条件，只有我们汤河周围的人、畜才能享受得到。

放猪

每年秋天，当地瓜、花生收获得差不

多的时节，生产队都要安排两名社员放猪。这时，社员们刚开春抓的猪仔大都长到了50公斤左右，一个三十多户的生产队，大壳郎猪就有二十几头，还有老母猪和小猪崽。村里会有那么几户有打算的人家，担心猪肥了卖掉后空圈，就早早抓个小猪仔备着，或放在院子散养，或圈在院中某个空闲地儿。

刚开始放猪的那天，各家不是拽着耳朵拖着，就是提着尾巴推着，而且前边有人唤，后边有人赶。有时猪惊得满街乱跑乱窜，需要几个人围追堵截。集中到一起后，还有相互咬仗的，要几个人在边上看着，这叫圈性(方言，即磨合)。

太阳落山的时候，队长会提前收工，让社员回村等着赶猪。往家赶猪比往外送的时候容易得多。放猪的人帮着将各家的猪从猪群中分离开，然后有人在前边“叭——叭——”或“唠——唠——”地唤着，后边的人赶着，穿街过巷，很快就可以领回家。用不了几天，猪就不用接送了，早晨自己去，晚上自己回，只要家门为它们敞开着就行。

猪放回来以后，不用喂食，但要饮水，有的加点花生饼或豆饼。集中放猪放到小雪过后，地冻得猪拱不下去才停。

催肥

经过一秋的放养，大多数猪都到了该催肥的时候了。这时各家各户不仅有了地瓜，还有打油后的花生饼，我们当地称作麻饼。煮熟的地瓜，混合上浸泡好的花生饼或豆饼水，有时还加上适量玉米面，猪特别喜欢吃。育肥这期间，不给猪吃粗饲料，一律是用精料。猪在圈里吃了睡，睡了吃，不几天就膘肥体壮起来，只等着收购站办事员来看猪了。

有很多年，收购站收猪要凭小票，这也是计划经济时代的一个小侧面。当村里来了看猪的，大家会相互转告，或者直接领着东家走西家看。拿不到小票的，即使急着送猪也无济于事，只有等着下回。

送猪

送猪的头天晚上，村民会想尽一切办法让猪吃好吃饱，这样既不会影响第二天的验收，又可以增加猪的体重。此外，还要约好手脚麻利、有经验的邻居帮着抓猪。

凌晨两三点钟，就会断断续续听到房前屋后、村东户西远近的猪叫声，甚至连周边村子隐隐约约也听得到。我们村离县城收购站只有二三里地，大多数用手推车推着去送猪。有一年我和父亲是赶着去的，因为养了两头，猪个头又大，父亲担心猪在车上乱动我架不住车子。

收购站是大批量收猪，大家按先后顺序将猪、车一起排队，长长的队伍足有几百米。

收猪的人根据猪的胖瘦，用大剪刀在猪后腩一侧分别剪上代表特等、一等、二等的符号。极少会出现三等，因为如果猪太瘦，收猪的人不会发小票，还会劝你让猪再加加膘。

送完猪的人，陆续拿着票据到指定的地点结账，一头猪总能换得百八十元钱。有几年凭票供给猪肉，送了猪还送几张肉票。拿着钱的人们，有的直奔供销社，如果是集日，会直接去赶腊月大集备年货。更多的是在肉店割上几斤猪肉提溜回家，痛痛快快地吃上一顿。

往事如昨

母亲的饼干盒和“功劳证”

孙光

母亲去世后，我把母亲老屋里的物品都收拾、清理了，只保留了一个老旧的铁制饼干盒和一本“功劳证”。在我心目中，它们是母亲留下的传家宝，我要好好珍藏。

我用手轻轻掀开饼干盒盖，一股陈旧的糕气气息飘来，也开启了我脑海里一段尘封已久的记忆。

我出生在1959年末，正赶上“三年自然灾害”时期，粮食和副食品奇缺，老百姓的生活十分艰苦。母亲说，她生下我后，就被检查出患了肝炎，无法给我喂奶，又买不到奶粉，大多时候只能用点米汤加点白糖喂我。那时，虽然父亲在部队机关、母亲在医院工作，但城市里什么东西都是凭票供应，何况即使有票、有钱也往往买不到急需的奶粉、糖等婴儿生活必需品。有一次，父亲单位的同事去上海出差，好不容易托关系才给捎回一盒钙奶饼干。

饼干吃完了，饼干盒却一直伴随着我的成长，盛满了我的童年回忆。那时候，父母把收入几乎全用在保证我们兄妹三人的生活上了，家里连件像样的家具都没有。不管多难，母亲都经常买来钙奶饼干或桃酥，放在饼干盒里。有时他们上班走得早，就用稀粥泡饼干给我们吃。

也许是婴儿时吃惯了饼干，我见了饼干总是吃不够。为了适当控制，母亲就把饼干盒放在卧室里高高的木架上。但这难不倒机灵的我，我有时会趁家中没人时溜进去，搬来凳子站上去偷吃。有一次晚饭后，我瞅见母亲领着妹妹出门散步了，马上故伎重演。没想到，她们突然又折返回来了。我呆呆地站在凳子上，手里还捏着几块“赃物”，一时不知所措。我上学后，学到“尴尬”一词时，立刻有切身的体会。幸好当时母亲只是笑着让我下来，并没有责骂我。

上世纪70年代，父亲从部队转业到了烟台打捞局，我那时已在他最后驻防的县城参加了工作。母亲临走时把装满饼干的饼干盒留给我，嘱咐我说：“饼干容易受潮，放在盒里把盖子扣紧就没事了。”那年冬天，我们16个工人住在一间屋内结冰霜的宿舍里，我把饼干盒放在靠近床头的木箱里。早晨我去食堂打来馒头、咸菜和热水，拿几块钙奶饼干泡在热水里，喝了后顿觉身子暖暖的。几年后，我调到了烟台，把这个饼干盒又带了回来，交给了

母亲。我结婚生子后，母亲用这个饼干盒继续装满钙奶饼干、桃酥等点心，哄得我儿子一回奶奶家就围着她和她手里的饼干盒转悠。

1950年，母亲18岁，她这一年参加了解放军，在工程部队医疗所担任护士。她留下的由胶东军区颁发的红色“功劳证”，里面记载了她先后两次荣立三等功，立功地点都是在烟台。立功事迹一栏里写的是：工作积极主动，对伤病员护理耐心细致，受到伤病员广泛赞扬等。

小时候，母亲经常给我讲她在部队抢救伤病员的故事。抗美援朝战争期间，国内的国防建设也在紧张地进行。有一次，一名战士在国防建设施工中受了重伤，在抢救中急需大量血液，母亲毅然伸出自己的胳膊说：“我是O型血，先抽我的吧！”在医生和大家的努力下，这名战士终于转危为安。母亲从小就教育我，今天的和平幸福生活来之不易，长大后要努力为国家多做贡献，使我从小就萌生了长大后也要参军保家卫国的梦想。

母亲退役到地方医院工作后，也一直是忙忙碌碌，顾不上家里，所以她的厨艺很一般。但退休后，她的厨艺日渐长进，我儿子就特别爱吃她做的炸酱面。那时，母亲在南洪街住，我儿子在跃进路小学上学，中午放学就到奶奶家吃饭。母亲做炸酱面总是自己和面擀出面条，下好后过水。然后，把黄瓜、胡萝卜和肉切成丁，把它们用花生油翻炒后，再加入豆瓣酱和水，一起炒至酱汁浓稠。面条吃起来很筋道，加入酱料后又香又鲜，非常好吃。

母亲到80岁时，病情逐渐严重，很多人和事都已不记得了。但只要看到我，她的脸上依然会露出慈祥的微笑，还会颤颤巍巍地指着放在书架上的饼干盒。我疑惑地打开一看，里面竟盛满了饼干。我顿时感到十分愧疚和感慨：在母亲眼里，儿子不管多大岁数都还是孩子，哪怕仅剩一点残存的记忆，也想着把最好的东西留给儿子，而我又给予了母亲什么回报呢？

母亲去世也快八年了，思念和感恩之情仍常常溢满了我的心房。母亲把我带到这个世界来，并抚养、教育我长大成人，经历了太多的艰辛和磨难。她虽没有给我留下什么值钱的东西，但她留给我的精神财富远比金钱更有意义、更有价值。